

我们的抗战

光荣时刻·山东抗战



1945年春,山东群众配合八路军反攻作战运军粮。(资料片)



无八路军主力支持 自建山东纵队

本报记者 刘帅

1937年10月,日军侵入山东。从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,短短1年内发生20多次抗日武装起义,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十大抗日武装起义。

抗战一爆发 就举行武装起义

抗战爆发后,中共鲁北特委、津南工委领导人于文彬、马振华等就开始在宁津、乐陵、盐山等县发动武装斗争。1937年7月,在旧县镇、黄夹镇举行武装起义,这是山东最早的抗日武装起义。

1936年4月,黎玉到山东工作,重建中共山东省委。1937年10月,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山东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。徂徕山、泰山、南靠蒙山,东临莲花山,西近津浦铁路。中共省委决定直接发起徂徕山起义。

1938年1月1日,在徂徕山脉山顶大寺,黎玉代表中共山东省委宣布举行抗日武装起义。新成立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,由洪涛担任司令员,黎玉担任政委,赵杰担任副司令员。

“大寺这几间破房子,只能让女同志住,男同志都住山窝窝里头,拿石头当枕头。”赵杰的女儿赵进军告诉摄制组。

成立山东纵队 统领各地武装

1937年12月24日,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县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,理琪宣告成立山东抗日救国军第3军。

1938年2月13日,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一举攻克牟平城,俘虏伪县长等一百余人。但战斗结束后,理琪等22名干部战士撤到雷神庙开会,突然被数倍于第三军的日寇包围,理琪壮烈牺牲,年仅30岁。

1937年9月到1938年6月,山东各地党组织先后在多地成功发动武装起义。1938年12月27日,经中共中央批准,在山东沂水县王庄正式组成八路军山东纵队,张经武任指挥,黎玉任政委。

山东省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丁龙嘉曾表示,山东纵队的成立,标志着散布在全省各地的游击队,成长为一支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。在抗日战争中,山东党组织的一个显著特点,是在没有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支撑下,单独建成了一支八路军队伍,那就是山东纵队。

115师入鲁 干部也补充进来

1938年3月28日,一个商贩打扮的人从临沂蒙山万寿宫出发,经过十多天跋涉,到达延安。此人就是黎玉,他此行要向毛泽东汇报工作。

黎玉要求中央派干部加强对山东的临指导,并希望一个主力团入鲁抗战,而毛泽东对黎玉讲,“看来还要多一些。”

1938年7月,115师永兴支队和129师津浦支队作为最早入鲁的主力部队抵达冀鲁边地区,萧华则率343旅机关和补充团部分干部百余人,于1938年9月进驻乐陵城。

1938年9月到11月,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,毛泽东提出“派兵去山东”。1938年12月20日晚,八路军第115师师部及686团组成的八路军东进支队向山东进发。115师曾在平型关痛击日军,进入山东后,取得了梁山伏击战、陆房战斗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,重创了日伪军。

(部分参考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《齐鲁烽火》)

开仓放粮救百姓 垦荒70万亩

敌后根据地用粮食促进军民融合

粮

1942年,河南大灾荒,山东也不例外,一些地区严重歉收,个别地区绝产,粮食出现严重困难局面。

或许吃的问题仅限于普通百姓,就像电影《1942》中国国民党军官说的,“饿死了一个灾民,地方还是中国的,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,我们会亡国。”然而,同样的灾荒,在山东抗日根据地,却到处发生着“最后一粒米,拿去做军粮”以及“开仓放粮打鬼子”的故事。



本报记者 寇润涛

攻下郯城,就为打开鬼子粮仓放粮

8月25日,在郯城县城,97岁的刘德生对打鬼子的往事随口就能说出哪一年发生的,但提起1942年沂沭河沿岸闹灾荒,他却忘得一干二净。

那一年刘德生24岁,在郯北游击队任中队长,穿行在沂河两岸打击日伪军。1943年1月,罗荣桓下令发动郯城战斗,刘德生所在游击队随之被编入115师的攻城部队。“攻打郯城”的字眼勾起了刘德生对饥

荒的记忆。他马上说,“想起来了,打郯城就是为了县城里鬼子的粮仓,当时地里产不出粮食,部队要吃饭,老百姓也得吃饭。”

郯城是鲁南入苏北的交通要冲,也是沂沭河冲积平原的重要粮食产区。日军侵占郯城后,高筑城垣,广修碉堡,易守难攻。当时,对于缺吃少粮的刘德生来说,攻打郯城,不仅是战略反攻的开始,更是为抢夺日军粮仓而组织的一场“生存战”。

频繁遭“扫荡”,八路军坚持反抢粮

“赤地千里”、“哀鸿遍野”……敌后战场上的饥民们,对于当时的国民党高层来说,很可能是看不到的。

1942年初,侵华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惨无人道的“拉网扫荡”,鲁南抗日根据地几近被日伪顽势力蚕食殆尽。115师政委罗荣桓曾凝望着一张鲁南地区沦陷形势图,那片他和战友们流血流汗开创的鲁南根据地,心情沉重地说:“没有了,鲁南没有了!”

形势图上,从抱犊崮到沂河边,能坚持

的村庄,没有几个了,剩下的仅是“东白山、西白山,南北漫子宝山前,纵横十余里,东西一线牵”。罗东进在回顾父亲罗荣桓这段过往时,这样给本报记者形容:当时山东的敌后根据地南北方向上面积很窄,说是“一枪打透的根据地”,一点都不假!

鲁南根据地沦为了无安全保障的游击区,刘德生说,“比如今晚我们住在这个村,明天就得赶紧搬到下个村,从没常驻过。”

1942年秋后,八路军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开展了敌占区反抢粮斗争,毕

竟粮食是农民的命根子,有了粮食,就有了生存的基础,就有了坚持敌后抗战的物质条件。

1942年麦收即将完结,中共临沂县委便号召恢复工作的党支部,发动群众,开展了反日伪抢粮斗争。沂河支队一大队在大队长李华源带领下,在日伪政权征粮并由日伪军强征强抢时,采用和支部联系群众共谋配合的斗争手段,由群众伪装送粮,县大队派出武工队半路截粮,粮食仍为抗日军民所有。

地主家送的煎饼,游击队分给老百姓

1942年到1943年之间,由于日伪军疯狂“扫荡”,临郯地区的共产党组织转入隐蔽活动,一时间汉奸当道,土匪群起,民不聊生,社会陷入极度混乱。

该地区属省际交界,自古多匪事。不过,绝大多数“草头王”是在伪化的混乱局面下,各村之间为了保护各自利益,找个靠山,挂个旗号,往往是“你向我村摊粮派款,我也向你村索物派捐”。参加者大多数是群众,武装人员大都是过去的抗日自卫队人员。

“这些人员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大前提下,天地良心没有泯灭,同情共产党,希望八路军抗日武装回来。”苍山县从事党史研究的专家穆振昂曾这样描述这些为了“粮食”而落草的人。据粗略统计,临郯地区仅神山、磨山、层山、长城、芦塘一带,大大小小土匪号称有103伙。

而作为游击队员,刘德生和战士们也得吃饭。他告诉本报记者,普通老百姓家里揭不开锅,他们就派人到地主、大人家

里,“我们不要粮食,就让地主烙煎饼,烙好后秘密送到指定地点,我们再去取。”

当然,一些地主、大户也深明大义,知道刘德生们是为了“打鬼子”保家卫国,所以每次送煎饼都尽可能多送些。游击队员人数不多,他们根据作战需要,留下必备的口粮,剩余的煎饼就分给普通老百姓。

“给百姓分吃的,看似是小事,但在饥荒年代,你给他一口吃的,他就敢给你卖命!”刘德生说。

动员农民生产,让敌后抗战有了物质基础

1942年秋冬及翌年的春夏生产,在八路军的支持下,推行春耕,消灭荒地,改变了因日军“扫荡”造成的破败景象,农民对生产有了信心,并迎来一个好的夏收。

截至1945年8月,山东抗日根据地共开荒和扩大耕地70多万亩,增产粮食6亿多斤,抗日武装发展到200多万人。那一年,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省政府成立时,根据地已经拥有了全省80%的国土、75%的人口,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早已名存实亡。

“民众生活虽仍是困苦的,但只要有了饭吃,就有了坚持敌后抗战的物质基础。”宋保武说,这样的故事,在山东抗战史上比比皆是,这让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产生了天然的亲近感。

贪污腐败,人民群众一直深恶痛绝。1940年山东临时参议会成立之初,就制定了一系列惩治贪污腐败的条例,比如“凡是贪污500块钱以上的,就枪毙。”

政治、经济上得到双重翻身的根据地

百姓从内心里热切拥护共产党。在莒南的参军动员会上,女青年梁怀玉说:“谁第一个报名参军,我就嫁给谁。”在乳山的胶东育儿所里,上千名八路军幼儿得到人民乳娘的哺育……

山东省委党校党建部副教授谭健说:“党和军队为老百姓做出的巨大牺牲,老百姓也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,同时老百姓也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,这二者是相互的。”